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 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题目：抗战时期大后方评论短刊与学院散文的“共生”

姓 名：李煜哲  
学 号：1601211260  
院 系：中国语言文学系  
专 业：中国现当代文学  
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导 师：吴晓东 教授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 题目：抗战时期大后方评论短刊与学院散文的“共生”

### 一、选题论证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评论短刊”的含义。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的一些文化重镇如昆明、重庆等地出现了许多小型刊物，它们大都存续时间不长，篇幅也较为短小，但仍构成了战时后方报刊出版的一道独特景观。例如，冯至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文章中，多次回忆起抗战时期昆明地区的小型周刊，如《生活导报》《春秋导报》《自由论坛》《独立周报》等，“撰稿人大都是昆明高等院校的教师和文化界人士”，并将自己写杂文的缘起主要归结为这些“一时风尚的小型周刊”<sup>1</sup>。解志熙将这类刊物称为“评论短刊”，认为这类评论性的小刊物大约从 1938 年开始崛起于昆明、重庆等地，如《新动向》《今日评论》《战国策》《星期评论》《当代评论》等；在 1942 年后此类评论短刊更为繁荣，如昆明就有《生活导报》《自由论坛》《民主周刊》《独立周报》《自由导报》等刊物。对于这类刊物的面貌，解志熙作出了如下描述：“这些评论短刊所刊发的多是关于时事政经的评论分析和感怀时事的随笔杂文等比较简短的文字，而支撑它们的编者、作者大都是南渡到大后方的北方学院知识分子。”<sup>2</sup>解志熙还指出这类刊物直接推动了战时散文写作的繁荣，并列举了一些有代表性的随笔体散文系列。解志熙的观察可以基本反映大后方所谓“评论短刊”这类刊物的总体面貌及其与学院知识分子的关系，因此本文的题目借了解志熙所界定的“评论短刊”这一概念。然而，在是否可以将评论短刊与战时散文写作的关系简单指认为前者促成后者这一点上，则值得进一步思考。经过对于相关材料的初步辨析，笔者认为用“共生”来形容二者之间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的关系，会更为妥当。

其次，如何定义“学院散文”，是本文同样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在既有研究中，以往学者们对于抗战时期的文人学者的散文面貌的关注已经催生了一些不同于传统文学史所叙散文的概念。例如，袁良骏对“学者散文”的界定更多地是从作品风格而非作者身份的角度来考虑的<sup>3</sup>。他认为，一般散文都是以情为主，对知识性会严加控制；而学者散文则主要不是用来表情，而是用来达意，主要表现手段不是抒情、写景、叙事，而是说理和议论。此外，学者散文还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并且往往体现出知者的幽默风趣。袁良骏根据职业比重和风格综合考虑，

<sup>1</sup> 冯至：《昆明往事》，作于 1985 年，原载《新文学史料》1986 年第 1 期，引自《冯至全集》第 4 卷，第 359 页。此外，在 1984 年写作并发表的《敲鼓与赶车——〈田间选集〉代序》同样提到 1940 年代兴盛的小型周刊：“这些周刊办得生动活泼，不少人在上边发表短论和杂文，人们除了日常的交往外，识与不识，经常能在小小的刊物上‘见面’。”（张恬编：《冯至全集》第 4 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305 页。）

<sup>2</sup> 解志熙：《文本的隐与显：中国现代文学学校读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04 页。

<sup>3</sup> 袁良骏：《战时学者散文三大家：梁实秋、钱钟书、王了一》，《北京社会科学》1998 年第 1 期。

认为如王力、梁实秋、钱锺书等人的散文可称为“学者散文”，而一些更多地以作家名世的学者如朱自清、闻一多等人的散文则不能称为“学者散文”。此外，解志熙则将战时学院文坛写作的散文视为“知性散文”，或言“随谈录”，并认为这种文体“与‘随感录’式的战斗性杂文、‘随想录’式的情调美文鼎足而三，构成现代随笔的三个分支”<sup>4</sup>。解志熙这样概括“知性散文”的特点：“这类散文的‘知性’品格，乃指融会其中的一种不离经验而又深化了经验的感受力、理解力，因为它既不同于理论论述的理性化、叙事抒情的感性化，也与激情意气有余而常常欠缺理性的节制及‘有同情的理解’的论战性杂文也迥然有别，所以不妨借用现代诗学中的知性概念而称这类散文为‘知性散文’。”<sup>5</sup>

可以看到，袁良骏所定义的“学者散文”和解志熙所定义的“知性散文”都是就这些散文本身的面貌而言的，是结合作者身份对散文的风格进行定性概括而抽离出的概念。然而，本文希望处理的以评论短刊为主要媒介载体的、学者所写的散文，并不拟遵循袁良骏与解志熙从风格上对此类散文作出的定义。因此，本文将使用“学院散文”这一概念，与上述“学者散文”“知性散文”的概念稍作区分。

至此，也有必要对于“学院散文”中的“散文”文体进行一定的说明。在既有文学史叙述中，已经形成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散文的脉络与内在分类的总体框架。例如，陈平原在《中国散文小说史》中提出“战斗的杂感与闲适的小品”是现代散文的两大主潮<sup>6</sup>，并强调了“文体的互相渗透”之为现代中国散文的一大特征<sup>7</sup>。然而在抗战时期学院人士的散文写作中，“战斗的杂感”和“闲适的小品”两大描述却并不完全适用。以“杂感”或一般所称的“杂文”为例，沈从文在抗战时期所发表的大量涉及时事与社会的杂文就很难称得上是“战斗的”：尽管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与人事多有批评，沈从文的杂文相比鲁迅及其追随者如聂绀弩等人的杂文而言，显然缺乏尖锐的斗争性，而更多地以一种“建言”的面貌呈现。而以“小品”或“随笔”而言，如冯至的“鼎室随笔”、冰心的“力构小窗随笔”、钱锺书的“冷屋随笔”、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等系列文章，也同样无法用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小品文的“趣味”、“平淡自然”、“苦涩”<sup>8</sup>等特征来描述。但如果像解志熙那样用“知性散文”来概括，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这些学院作者们的文风内部同样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仍以沈从文为例，他的非杂文性散文的气质就很难与其他一些学院作者散文的“知性”相提并论。可以看到，抗

<sup>4</sup> 解志熙：《文本的隐与显：中国现代文学学校读论稿》，第109页。

<sup>5</sup> 解志熙：《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40页。

<sup>6</sup> 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3页。

<sup>7</sup> 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第214页。

<sup>8</sup> 温儒敏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中，指出周作人所重视的“小品文”及相关的“趣味”、“平淡自然”和“苦涩”等散文批评概念，对于二三十年代整个散文创作及批评领域都有重要影响。见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页。

战时期学院作者们的散文面貌确实有其无法被既有文学史叙述完全统合进去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与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学生产历史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也是笔者希望处理抗战时期大后方评论短刊与学院散文的“共生”关系问题的缘起。在阅读相关作家如沈从文、冯至、冰心等人全集的过程中，笔者感到他们的战时散文写作在他们自身的创作脉络中较为“独异”；然而如果回到这批作品的写作语境，其“独异”性或许正是大后方学院这个作者群体散文写作的某些“群性”。为此，从文类生成的角度进入，关注到这些作品的生成机制和背后所体现的学者们的话语姿态，也许不仅能解决笔者自己的阅读困惑，也同样能对关于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生产之复杂图景的研究有所补益。

本文计划关注的主要报刊如下：《今日评论》（1939 昆明）、《战国策》（1940 昆明）、《星期评论》（1940 重庆）、《当代评论》（1941 昆明）、《生活导报》（1942 昆明）、《自由论坛》（1943 昆明）、《春秋导报》（1943 昆明）<sup>9</sup>等。这些刊物都可以称为“评论短刊”，是学院作者群发表散文的主要阵地。此外，有的文章也会在一些机关刊物或大报副刊上发表，如王力的“龙虫并雕斋琐语”在《星期评论》停刊后就被编者送到《中央周刊》进行发表<sup>10</sup>；在《中央日报》的副刊《平明》和昆明版《星期增刊》上，也有学院作者的一些散文<sup>11</sup>。因此在具体的讨论中，如果涉及的相关文本与这些非评论短刊的刊物有所关联，也可能一并纳入。而本文计划讨论的主要作家作品则包括：王力在《生活导报》《自由论坛》等刊物上发表的“瓮牖剩墨”“龙虫并雕斋琐语琐语”“棕榈轩詹言”系列，冰心在《生活导报》上发表的“力构小窗随笔”系列，梁实秋在《星期评论》等刊物上发表的“雅舍小品”系列，钱锺书在《今日评论》上发表的“冷屋随笔”系列，以及冯至、沈从文、杨振声、费孝通等人在诸多评论短刊上所发表的散文。

## 二、研究综述

解志熙在《文本的隐与显：中国现代文学学校读论稿》《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学校读论集》《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中的相关文章中所关注的相关作家及其在抗战时期的文学行为，与本论文密切相关。其中，《别有文章处心裁——中国现代“知性散文”叙论》对40年代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钱锺书的《写在人生边上》、冯至的《决断》《认真》等文、李霁野的

<sup>9</sup> 括号内数字为创刊年份，地点为创刊地点。

<sup>10</sup> 见王力 1944 年应《当代文艺》编者所邀而写的“作家生活自述”，原载 1944 年《当代文艺》第 1 卷第 4 期，收入《龙虫并雕斋琐语》（《王力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 年，第 358 页。

<sup>11</sup> 如 1939 年 10 月 28 日《中央日报·平明》上发表过沈从文的《时空》（署名上官碧，在收入 1941 年 8 月出版的单行本《烛虚》时改为单篇文章《烛虚》的一节）；《昆明中央日报星期增刊》从 1944 年 5 月 14 日起至同年年底，曾由王力编辑。

《给少男少女》集和杨振声的《拜访》《被批评》等文的文章风格进行了阐释，并将40年代的“知性散文”放在现代文学散文发展脉络中进行评价<sup>12</sup>。解志熙此文为理解40年代冯至、杨振声、钱锺书、梁实秋等人散文各自的风格提供了参考。不过在此处他侧重于考察40年代学院知识分子散文的整体面貌，因此除关注到报刊上发表的散文外，也关注到一开始就以文集面貌出现的散文作品，而后者则不在本文主要的关注对象内。此外，《沈从文杂文拾遗》<sup>13</sup>《沈从文佚文废邮再拾》<sup>14</sup>《补遗与复原——冰心40年代佚文辑校录》<sup>15</sup>《杨振声随笔复原拾遗录》<sup>16</sup>等文章所提供的冰心、沈从文、杨振声等人在40年代的佚文辑录，也是本文需要处理的重要文本资源，并为搜寻相关原刊提供了重要线索。而与上述佚文相配的相关分析文章对理解作家心境、写作语境等问题同样能提供很多启发：《感时忧国有“狂论”——〈战国策〉派时期的沈从文及其杂文》论及战时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问题，并重新讨论了沈从文与《战国策》派的关系<sup>17</sup>；《人与文的成熟——冰心40年代佚文校读札记》则指出了冰心在40年代个体心境的转变，实现了“人与文的成熟”<sup>18</sup>；《气豪笔健文自雄——漫说北方文坛健将杨振声兼谈京派问题》，将杨振声抗战期间的随笔放在南渡北方学院文人竞相写作随笔的风气中讨论<sup>19</sup>，已经触及到笔者希望进一步讨论的评论短刊语境下学院散文写作的“共性”问题；《“灵魂里的山川”之写照——且说冯至对中国散文的贡献》中分析了影响冯至战时“鼎室随笔”写作的西方资源与这些随笔的风格特征，并将之归为“40年代艰难时世中崛起的评论短刊所催生的‘知性散文’之列”<sup>20</sup>。在本论文中，如何在汲取解志熙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与这些研究进行对话，也是在写作中需要重点完成的工作之一。

在抗战时期大后方散文写作方面，既有研究对左翼作家创作的关注为理解学院知识分子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战时语境参照。例如，尹鸿禄的专著《大后方散文论稿》，分为杂文、记叙抒情散文和报告文学三编，对大后方的主要文学流派与作家作品进行了梳理，在杂文编重点关注聂绀弩、郭沫若、冯雪峰、夏衍等人“匕首投枪”式的写作，在记叙抒情散文编则关注茅盾、巴金、李广田、缪崇群、沈从文、丰子恺等人对战时社会人生的描摹<sup>21</sup>。与之类似，吴野、文天行主编的

<sup>12</sup> 解志熙：《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第339-346页。

<sup>13</sup> 解志熙：《文本的隐与显：中国现代文学学校读论稿》，第192-208页。

<sup>14</sup> 解志熙：《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0-136页。

<sup>15</sup> 解志熙：《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第215-236页。

<sup>16</sup> 解志熙：《文本的隐与显：中国现代文学学校读论稿》，第112-138页。

<sup>17</sup> 解志熙：《文本的隐与显：中国现代文学学校读论稿》，第166-191页。

<sup>18</sup> 解志熙：《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第252页。

<sup>19</sup> 解志熙：《文本的隐与显：中国现代文学学校读论稿》，第70-111页。

<sup>20</sup> 解志熙：《文本的隐与显：中国现代文学学校读论稿》，第164页。

<sup>21</sup> 尹鸿禄：《大后方散文论稿》，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

《大后方文学史》在“散文”专章中也将散文分为报告文学、杂文、记叙抒情散文三个类别，重点关注的作家主要是接近左翼的一群人，如丘东平、聂绀弩、冯雪峰、《野草》作家群、郭沫若、茅盾等人<sup>22</sup>。虽然也论及李广田、沈从文等学院人士，所讨论的作品范围仍然较为狭窄，限于李广田的《圈外》《回声》《日边随笔》和沈从文的《湘西》等曾作为单行本出版的散文集，并未关注到他们战时更为丰富的写作面向，如沈从文在战时评论短刊上发表的与《湘西》等乡土写作脉络下的作品风格迥异的议论性杂文。尽管上述研究的关注重点可能并不在学院作者群这一版块，但这些对于大后方文学的研究仍然能在大后方文学思潮、社会背景等方面为本论文提供很好的资源。王学振的《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片论》中设专章讨论的大后方民族文艺运动及鲁迅纪念活动<sup>23</sup>，也可以在本文所计划讨论的评论短刊当时的刊物面貌中呈现出来。在讨论具体作者的战时散文时，相关作品可能正受到这些文艺思潮的影响，因此了解这些具体历史语境，既有助于跳出对散文进行总体风格研究的窠臼，也有助于将问题历史化，从而更好地完成本文讨论文学生产机制的构想。

在抗战时期大后方以报刊为中心的文学空间生成方面，余爱春的博士学位论文《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及其论文《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生产》以桂林为例，集中探讨了文学生产与相关报刊、图书的关系<sup>24</sup>。以传媒视域阐释大后方的抗战文学生产，是本文同样需要做的工作，但如何以某一类文体和某一群人为核心，将文学生产的话题更为细化、历史化，是本文所希望实现的目标。因此，本文拟采取以话题串联而非以出版物串联的方式，对抗战时期大后方散文文体、学院知识分子、评论短刊三者的有机关系进行爬梳与综合，力求以对历史肌理背面的探寻为审美型散文阐释方式提供新的观照。

在与战时大后方学院知识分子相关的研究中，关于西南联大学院知识分子的研究成果颇丰。姚丹的专著《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中对于冯至、沈从文、卞之琳等教师的写作有着细致分析，并对西南联大相关的文学社团与杂志期刊作出了梳理<sup>25</sup>。易杜强的专著《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对于西南联大各院系教授与教学情况的介绍则为理解西南联大学院提供了重要史料<sup>26</sup>。西南联大作者群固然是战时学院作者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群体，不过在关注评论短刊与学院散文的“共生”关系时，其他学院作者如梁实秋、冰心等人同样不容忽视。从身份上来看，若以学院而言，西南联大学院与梁实秋、冰心等远在重庆学院人士似

<sup>22</sup> 吴野、文天行主编：《大后方文学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380-499页。

<sup>23</sup> 王学振：《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片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27页。

<sup>24</sup> 余爱春：《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南京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余爱春：《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生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期。

<sup>25</sup> 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sup>26</sup> （美）易杜强著，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

乎区隔甚远；若以南渡的北方学院文坛而言，费孝通、王力等学者也似乎应当在“学院文坛”之外。这种身份上的区分在讨论具体作者时固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但跳出这种以地域、文坛或学校来划分的方式，他们在战时散文写作的互通之处则让他们可以共同被纳入大后方学院作者群，也让本文将他们作为一个作者群进行整体与内部的观照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

最后还想对方法论层面的可供参考的研究作一些说明。在讨论报刊与文学生产的关系方面，雷世文的专著《文艺副刊与文学生产——以〈晨报副刊〉、30年代〈申报·自由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中心的研究》关于现代文学中的报刊与文体生成关系的梳理，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研究方式。例如，在“文艺副刊对于小品文文体技术的影响”一节中，他分析了文艺副刊的版面空间对于小品文体制的影响，定期出版物的出版形式与小品文品格的“契合”关系，以及报纸正张新闻纸的信息感对文艺副刊上小品文取材的影响<sup>27</sup>。而在“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学院文化色彩”一章中，他指出了报纸学术性副刊与文艺副刊在编者和作者群层面上的学院色彩，并通过指明文艺副刊可常见学术性理论文字来进一步从内容层面说明上述刊物的学院气质；他还从地理位置的角度，指出了北京文化对于文艺副刊的文学生产的影响<sup>28</sup>。雷世文对于《晨报副刊》《申报·自由谈》《大公报·文艺》等文艺副刊的分析，对于本文可能会讨论的部分问题有重要参考价值，如学院作者、编者与评论短刊的关系，评论短刊的形式和社会时评内容对评论短刊所发表的散文风貌的影响。姜涛的论文《“集纳”空间与“马凡陀山歌”的生成》，则将“山歌”这一战时国统区独特的文体形式置于报纸的“集纳”空间中进行考量，对本文如何探讨学者散文在评论短刊语境中的文体生成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启发<sup>29</sup>。在本论文中，笔者希望在对相关问题进行整体概述的基础上，以具体的个案与文本分析进入历史，从更细微的角度阐释战时大后方学院散文与评论短刊关系。

此外，在讨论文学形式的生成方面，张丽华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对于“短篇小说”这一文类如何在清末至“五四”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中被构建的探讨方式，则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不过文类的生成并非本文的全部核心问题——本论文力图处理的既非单纯的评论短刊，也非单独的学院散文，而是二者之间的“共生”关系。进一步说，这其中既包括某种文本生成机制，即评论短刊如何推进并形塑了部分学院散文的面貌；也包括某种“反作

<sup>27</sup> 雷世文：《文艺副刊与文学生产——以〈晨报副刊〉、30年代〈申报·自由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中心的研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142-148页。

<sup>28</sup> 雷世文：《文艺副刊与文学生产——以〈晨报副刊〉、30年代〈申报·自由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中心的研究》，第168-210页。

<sup>29</sup> 姜涛：《“集纳”空间与“马凡陀山歌”的生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用”，即学院作为给评论短刊供稿的主要作者群，以及在学院作者与编者、读者的三维互动之间，评论短刊的面貌如何受到影响。换言之，“共生”意味着某种“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而抗战时期大后方学院散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的白话散文发展理路中的“独异”与“类同”，或许也正在这样纵横交错的联动关系中得以形塑。

### 三、论文提纲

#### 绪论

##### 1. 评论短刊与学院散文的界定：

- 评论短刊的面貌与代表性刊物
- 学院散文的主要代表人物及相关文本

##### 2. 为何以“共生”命名评论短刊与学院散文的关系

一方面，二者相互影响。评论短刊的激发了学院散文多重面貌的生成，既有与社会现实、文化风向紧密配合的杂文写作，而且也带来了“小品”/“随笔”系列散文的繁荣。另一方面，二者相互依存，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学院知识分子是这些评论短刊的主要作者群，因此学院特色既是这些刊物的重要特征，同时其中部分刊物又因时政新闻版面的存在而呈现出综合性面貌。此外，受到社会经济的不稳定性、出版检查制度与战事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评论短刊的存续时间一般不长，也难以保证按时按期出版，而在大后方评论短刊繁荣的风潮过去后，许多学院作者具有“独异”面貌的散文写作也随之结束。因此，二者之间可以说存在着一种相互缠绕的“共生”关系，而要把握这种“共生”性，则需要从更为细微具体的文学事件、文本形式与报刊形态入手来进行体察。

### 第一章 约稿与“力构”：学院散文的生产机制

#### 1. 约稿与学院文化场

王力、梁实秋、冰心等人在抗战时期写作的随笔小品，很多是应相关刊物的编者或作者邀请、约稿而作的。王力在《〈生活导报〉和我》中就提到，在《生活导报》上发表的“龙虫并雕斋琐语”系列文章，是因为《生活导报》的主要撰稿者之一费孝通的邀请<sup>30</sup>；梁实秋写作“雅舍小品”系列，也是应《星期评论》主编刘英士之约而为<sup>31</sup>。冰心自言这种写作状态为“力构”，因此本文拟以冰心为

<sup>30</sup> 王力：《〈生活导报〉和我》，1942年11月13日《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

<sup>31</sup> 业雅：《序》，收入《雅舍小品》（1949年初版，暂时未见原书）；《梁实秋雅舍小品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页。



详细例子，指出某种约稿与“力构”式写作的散文生产机制。需要讨论的问题可能包括：为什么编者会向学院知识分子约稿？学院知识分子内部的人际网络对于被约稿作者的影响？<sup>32</sup>

因约稿而“力构”虽是许多作家写作中难以避免的写作行为，但在抗战时期评论短刊以与时事新闻及与此相关的社会评论、学术论文为主要内容的整体面貌中，一些学院作者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以随笔小品这类文学性散文交稿，则显得有些特别。评论短刊依仗学院文人之文名（如冰心、梁实秋）来丰富刊物的面貌，而在有限的篇幅与时间内，篇幅较短、连续性较弱的随笔小品则成为作者与编者的共同选择（见编者在相关随笔后所写的简单介绍，如《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冰心的《力构小窗》一文的最后的编者按语，《星期评论》1940年第1期最后一页编者所撰《最后的补白》等）。

评论短刊以编者为核心，由编者约稿而形成较为稳定的以学院人士为常任撰稿人的作者群，而稿件内容则往往从学者自身的研究趣味与社会思考出发，并与当前阶段的某些社会现实问题有一定关联，可谓以“学术”加“社会”为内容生产的核心。而不那么学术和专门化、具有较强文艺性的随笔小品、杂文等文体则相对自由，可以发挥作者所长，不一定会直接表达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但作者在写作中常常体现出与读者互动的自觉，以“作者”加“读者”为内容生产的核心。所以综合而言，评论短刊的内容生产体现出了“学术—社会—作者—读者”的丰富联动关系。

## 2. “山居”与学者的“力构”写作

对读冰心30年代对自己写作状态的期许、1940年初应学生邀稿发表在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默庐试笔”系列，以及1942年应《生活导报》编者之邀而写的“力构小窗随笔”系列，可见作者的写作心境与散文的风格面貌都有所差异<sup>33</sup>。继钱锺书1939年的“冷屋随笔”系列和梁实秋1940年开始陆续发表的“雅舍小品”之后，冰心1942年执笔的“力构小窗随笔”系列的面貌也与前

<sup>32</sup> 关于编者与作者的关系问题，《文学社会学——罗·埃斯卡皮文论选》关于文学生产的讨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埃斯卡皮指出，出版职能主要包括三方面：挑选、生产、发行。在挑选方面，出版商首先设想有一批可能存在的读者大众，同时又以引导养成新习惯来左右读者大众；而当出版商通过文学专刊和一些定期杂志逐渐创立起关于某些文学体裁的美学和学说时，出版商不仅能框定并控制读者，甚至能让读者群与作者群建立起个人的联系（罗贝尔·埃斯卡皮著，于沛选编：《文学社会学——罗·埃斯卡皮文论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2-46页）。与此类似，在抗战时期大后方评论短刊相关的约稿与写作机制中，同样可能存在报刊编者利用学院知识分子的声望框定读者、保证报刊发行量的情况（一些刊物最后会有专门栏目介绍本期的主要作者，一般是高校教授、作家与政府内研究员，如《今日评论》的“本期撰者”、《星期评论》的“最后的补白”）。但就具体作者被约稿而言，还应注意作者与报刊编者的人际交情及相应的以学院为中心的人际圈：如《星期评论》主编刘英士是吴文藻、梁实秋等人在清华大学时的同学，曾通过吴文藻向冰心约稿（“关于女人”系列文章），并向梁实秋约稿（“雅舍小品”系列文章）。

<sup>33</sup> 例如，“默庐试笔”充满对北平故乡的怀念，甚至在最后超出冰心一向的温婉气质而喊出要“杀”回北平；而《力构小窗》《探病》《请客》《做梦》等文章中，北平与战争所引起的心境的动荡与不安则远去了，只写一些由日常事情引起的感想。

两者各有相似之处，如都喜欢书写自己的写作环境——“冷屋”“雅舍”“潜庐”，以及杨振声《书房的窗子》。联系战时许多学院知识分子在大后方的居住地选择呈现出“山居”状态，由此应编者约稿加上室内“力构”的写作状态影响到他们的创作。（另，冰心的《探病》与杨振声的《拜访》都体现出了文化人洁身自好、厌恶无聊交际的“雅癖”；沈从文“七色魔”系列散文中对呈贡乡居环境的书写，杨振声《邻居》描绘居处的嘈杂，也可侧面反映他们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的生活与写作心境。）

## 第二章 从“幽默文学”到“说笑”：新幽默的生成

### 1. 从“幽默文学”说起

抗战时期评论短刊上的随笔小品“幽默”的生成模式，与 30 年代以林语堂及其《论语》《人间世》等刊物为代表的“幽默”并不相同。如果说《论语》《人间世》等刊物是“刊以人聚”的同人刊物，那么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化圈内的《星期评论》《今日评论》等评论短刊则是“刊以质聚”的内容导向型综合性刊物。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常常以“攻击讽刺他者—被他者反击—同人自我维护”的模式构成内容运作，其中“人”即同人群、普通读者及其他文学阵营内人士构成了内容生产的核心。后者则以内容本身为导向，刊物自身不设明确的主张与立场，而且由于学院作者群的中立性，表现在刊物内容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大为减少，是一个更为综合与相对客观的文化场域。

刊物面貌的这种差异性，也影响到了刊物上所发表的作品“幽默”面貌的异质性。由此，对读林语堂在《论语》《人间世》上发表的幽默文章与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钱锺书的“冷屋随笔”系列文章，来考察一种“说笑”式新幽默的生成<sup>34</sup>。其中，梁实秋“与抗战无关”引起的论战可能也需作为考察其“雅舍小品”时的背景，但是否如研究者所言“雅舍小品”是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的产物<sup>35</sup>，则有待辨析。

<sup>34</sup> “说笑”一词是借用钱锺书的《冷屋随笔》之四的说法，该文在收入《写在人生边上》时题名为《说笑》。此文直接针对林语堂所提倡的“幽默文学”，并多有嘲讽（参见孔庆茂《钱锺书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年，第 98 页）。

<sup>35</sup> 见叶永烈：《我看梁实秋》，收入《梁实秋雅舍小品全集》。本文对梁实秋与鲁迅的论争、与左翼文人“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进行了史事梳理，将梁实秋写作“雅舍小品”的文学行动视为梁实秋对“与抗战无关论”的自我标榜与对抨击者的反击：“《雅舍小品》以一个‘雅’字（虽然原是他的友人龚业雅的名字）贯穿始终，是他的‘与抗战无关论’的实践。从头至尾不涉及政治，却十分注重知识性。”（第 9 页）

## 2. 随笔小品的位置

一方面自我贬低,对于自己“堕落”到写作这种并不高贵的随笔小品文体而自嘲,对于自己的文人身份进行自嘲。较有代表性的文本有:钱锺书《冷屋随笔》之二、三<sup>36</sup>,王力《〈生活导报〉和我》自嘲“王了一跟着林语堂堕落了”;王力《富》《写文章》等文章中自贬自己所写的这些“琐语”。另一方面却喜用讽刺笔法,字里行间充满傲气,其中以钱锺书的“冷屋随笔”系列尤为突出。对于随笔小品这一文体的轻视从这类作品在评论短刊上的地位也可看出:作为学院聚集重要园地(而非以老作家坐镇来鼓励与发掘文艺新秀的文艺性专刊<sup>37</sup>),随笔小品主要作为点缀性质的专栏而存在。这固然主要由刊物的时政性质使然,但也反映出,无论编者还是作者,都并不把随笔小品这类写作视为正途。

考虑到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趣味主义”小品文运动<sup>38</sup>,以及30年代关于小品文的论争,抗战时期学院知识分子们对于小品的这种态度也可反映出他们的内在立场。然而,一面自嘲、视随笔小品为文体中之下品,一面却又大量地写作(加上钱锺书收入《写在人生边上》的其他作品),这种矛盾性反映出评论短刊作为学院发言的公共场域对他们写作的影响:在评论短刊所汇聚的大量严肃写作中间杂这种“油滑”、插科打诨的文字,减小学者与更广大的读者的界限,向人们展现学者群体的另一种风貌(评论短刊的性质与定位问题)。

## 第三章 “诗可以怨”:“怨”式情感结构及其超克

### 1. 学院散文的“怨”式情感结构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高校学者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战前大学教授的薪资很高,而抗战期间薪资却大幅缩水,甚至与小学教员接近,而大学教授一般拖家带口,家累繁重,因此生活日趋艰难<sup>39</sup>。因此,物价的变动对于许多学院人士的生活影响很大(可援引沈从文的私人书信中关于物价问题的描述为例):如王力受经济困难所迫,常常依凭“卖文为活”<sup>40</sup>来增加收入。以物价与教授薪金问题为

<sup>36</sup> 收入《写在人生边上》时分别题名《释文盲》和《一个偏见》。

<sup>37</sup> 《华北日报》之“文学”副刊的编者称,采取编辑约稿的方式既可以“借重老作家的名望,维持刊物的信用,增加读者的兴趣”,也可以“鼓励新进作家的勇气”(见编者:《三十一期小言》,《华北日报·文学》第31期,1948年8月1日。)

<sup>38</sup> 参考周仁政:《论后期京派文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sup>39</sup> 参考闻黎明在《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第七章中关于大学教师的薪资问题和加薪风潮的论述,上海书店,2003年,第272-278页。

<sup>40</sup> 参见汇总老舍、靳以等人自述的《作家生活自述》中王力(王了一)的自述:“两年前,也因受了《星期评论》几十期的赠阅,想要报答报答;又因穷得透不过气来,想恢复十余年前的‘卖文为活’的生涯。既然以卖文为目的,就该多产,要多产除非‘瞎胡调’,于是我开始写小品文。”(1944年《当代文艺》第1卷第4期,第39页)

代表的现实问题也在学院散文中有所反映(如沈从文《变作风》,冯至《致敬》),其中以王力这一时期所作的小品文最为典型。

由此,本文拟分析王力发表在《星期评论》、《生活导报》、《中央周刊》、昆明《中央日报》增刊等刊物上的《书呆子》《清苦》《领薪水》《卖文章》《战时的书》《战时的物价》《灯》《住》等文所体现出的某种“怨”式情感结构,并结合相关评论短刊上的其他涉及物价、教授薪资等问题的社会评论文章、学术论文等一并考察。其中《领薪水》比较特别,王力在针对此文的给读者的回信中否认“怨”背后的现实依据,体现出了评论短刊上作者、刊物与读者的三维互动关系<sup>41</sup>。同样可以纳入讨论的是冯至1944年6月在《生活导报》上发表的《答某君》,也是作者如何在于读者的互动中对“怨”的消极意涵进行否认生动个案。抱怨与牢骚笔墨都是因“怨”或“愤”而作,这种“穷苦之言”只有“憔悴之士”方可言说<sup>42</sup>;但学者却又要在这种“怨”遇到善意的回报时否定掉“怨”所隐含的“憔悴之士”形象,否定个体所遭遇的不幸。这种否定并不意味着“穷苦之言”是虚构,而是暗含着学院内知识分子的战时选择。

## 2. “怨”之超克:“抗战建国”的思考

沈从文与冯至在抗战时期评论短刊上发表的诸多杂文,都表达出了对于战时“抗战建国”问题的关注与思考。1940年,沈从文在《战国策》上以“续废邮存底”为题发表四封致读者、作者的回信,将做人、创作等话题与“建国”相关联,反复强调个人在抗战时期应当向“明天”看去,为抗战后的“建国”树立的健康积极的人生观。此外,在《战国策》上同样刊载有沈从文的《白话文问题》《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小说的作者和读者》等文章,也同样关注个人在战时应当如何做才能有助于“抗战建国”<sup>43</sup>。这些文章与沈从文同时期的《长庚》《潜渊》等文章不同,后者多对现实表示不满与悲观、具有“怨”的情感结构的文章,而前者则如《烛虚》所言似“传道”,在努力向读者或听众<sup>44</sup>传达积极的态度。

<sup>41</sup> 当时有读者因为读了此文而非常同情大学教授处境,于是通过《生活导报》向王力汇款二百元,王力婉拒了这笔钱并在《生活导报》上发表了一篇短信来回应这位读者。从读者受到感动而汇款这一行为可以看出,这批小品文不但直接关涉当前的社会现实问题,而且直接引起了读者的互动——原本的“姑妄言之”的抱怨式玩笑文字,被读者理解为作者惨淡的现实处境,在公开回信中,作者一反此前“怨”的态度而以严肃诚恳的语气进行回应,澄清读者所理解的“写实”实际上的虚构性。在报刊这一具有丰富联动性的文化场域中,这种“写实”与“虚构”的张力也指示出随笔小品这种文体形式所可能蕴含的某些复杂性。

<sup>42</sup> 钱钟书:《诗可以怨》,《文艺评论》1981年第1期,后收入张隆溪、温儒敏编:《比较文学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有修改)。

<sup>43</sup> 如沈从文《白话文问题》:“我们若生活在任何困难情形下,总远远不气馁,且在各种方式下,时时刻刻都能把自己一点力量,粘附到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这个国家,总会从急风猛雨中,慢慢的站起来,向幻想迈进,任何恶邻想用战争方式或怀柔政策来妨碍我们的发展,是办不到的。要消灭我们,更是不可能的!”(沈从文:《白话文问题——过去当前和未来检视》,见《战国策》第2期,1940年4月)

<sup>44</sup> 《小说的作者和读者》原为沈从文在1940年8月3日在联合大学师院国文学会的讲稿,后发表于该年

沈从文以学者主办的短刊（《战国策》）为载体向读者传递面对现实与未来的信心，从这种写作中可以看到评论短刊所拟想的读者群体的存在对于作者言说姿态与方式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在写作中对“怨”这种情感的处理方式有多种：或将“怨”油滑化，以自嘲口吻减弱“怨”中“愤”的成分；或以对“抗战建国”的思考及由此触发的对社会与国家的强烈责任感，对“怨”的情感进行超克。而冯至在1943至1944年在《生活导报》上发表的诸多散文，也展现了类似的对“怨”的超克方式——如《工作而等待》《方法与目的》。

## 第四章 术业如何公共化：学院散文与西方资源

### 1. 术业的公共化：在学术与读者之间

钱锺书、冯至等人在写作散文时都喜欢取用西方文化资源（冯至《认真》——里尔克，《空洞的话》——歌德，《忘形》——巴斯卡尔，《读书界的风尚》——雷马克等；钱锺书《冷屋随笔》四篇均是）。用钱锺书自己的话来说，如此“小题大做”<sup>45</sup>，才能吸引读者。他们多是取用西方学术层面的文学文化资源（与下面要说的梁实秋、王力等人取用西方社会与习俗层面的文化资源不同），但二人在如何将这些学术性资源内化进自己的散文上则有所不同（对读）。

其中，钱锺书《冷屋随笔》四篇文章均发表于《今日评论》上，而《今日评论》主要刊载了学者专家们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学等诸多领域的论文，钱锺书的“随笔”系列写作，在其中较为独特。《今日评论》第一卷一般将文学类文章编排在最后，钱锺书的《冷屋随笔》正居此列<sup>46</sup>。与其他专业性较强的论文不同，“随笔”呈现出了学术公共化的另一种写作形式：既与现实有所互动，又“下笔不拘”<sup>47</sup>。

### 2. 中西文化对比：漫画式写作

与钱锺书、冯至的学术性选取西方文化资源化入自己的散文写作所不同，梁实秋、王力等则采取了一种脸谱化的方式来进行中西文化对比（王力《迷信》《劝菜》《请客》《虱》，梁实秋《洋罪》等），借以指出中国当前社会现实中的一些问题。这种对文化进行概述的书写方式难免片面，如费孝通在写作《旅美寄言》时

---

8月15日《战国策》第10期。

<sup>45</sup> 参见钱锺书：“借系统伟大的哲学家（并且是德国人），来做小品随笔的开篇，当然有点大才小用，好比用高射炮来赶蚊子。不过，小题目若不大做，有谁来理会呢？”（见钱锺书：《冷屋随笔之二》，1939年《今日评论》第1卷第6期，第11页）

<sup>46</sup> 与钱锺书《冷屋随笔》一同排列在《今日评论》最后三篇以内的位置上的散文，还包括钱穆《病与艾》（1939年第1卷第3期），杨振声（署名希声）的《拜访》（《今日评论》1939年第1卷第3期），林徽因（署名徽因）的《彼此》（《今日评论》1939年第1卷第6期）。

<sup>47</sup> 钱锺书：《冷屋随笔》，《今日评论》1939年第1卷第3期。

所言——在《一张漫画》中，费孝通反思自己在写通讯向国内读者介绍自己在异国的经历和见闻时，其实是“在画一幅漫画给我的读者”<sup>48</sup>。尽管这种中西文化的印象式、个人感受式对比不免偏颇，但仍然为评论短刊的编者和读者所看重。结合抗战时期大后方的中外文化交流语境、学院个体的求学经历与战时出访经历，思考他们的散文书写中这种将西方文化资源的公共化方式的意义。

## 结语

## 四、参考书目（按拼音首字母排序）

### 1. 报刊、资料汇编

《春秋导报》（1943），昆明春秋导报社编辑。

《当代评论》（1941-1944），昆明当代评论社编辑并发行。

《独立周报》（1945-1946），昆明文聚社编辑。

《今日评论》（1939-1941），昆明今日评论社编辑并发行。

《论语》（1932-1937），林语堂、陶亢德、郁达夫等主编，上海中国美术刊行社发行。

《人间世》（1934-1935），林语堂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发行。

《生活导报》（1942-1944），陈尚凡、熊锡元、傅欣等编辑，昆明生活到报社编辑并发行。

《星期评论》（1940-1942），刘英士编辑，重庆星期评论社出版。

《战国策》（1940-1941），昆明战国策编辑社编辑，战国策发行部发行。

《自由论坛》（1943-1945），昆明自由论坛社编辑并发行。

阿敏古（温儒敏）：《梁实秋年谱简编》，《文教资料》1990年第2辑。

李宗刚，谢慧聪选编：《杨振声研究资料选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

四川省档案局编：《抗战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年。

唐沅，韩之友，封世辉等编著：《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

田蕙兰，马光裕，陈珂玉编：《钱钟书 杨绛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

---

<sup>48</sup> 费孝通：《旅美寄言·一张漫画》，1945年《自由导报周刊》第4期，第11页。

王大明，文天行，廖全京：《抗战文艺报刊篇目汇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

吴俊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吴世勇编：《沈从文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

周勇，王志昆主编：《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联合目录》，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

卓如编：《冰心年谱》，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年。

## 2. 作品集、著作

冰心著，卓如编：《冰心全集》，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

冯至：《冯至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梁实秋：《梁实秋散文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年。

梁实秋：《梁实秋雅舍小品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林语堂：《人生殊不易》（“林语堂文集”丛书），北京：群言出版社，2011年。

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上海：开明书店，1941年。

秦贤次编：《刘英士先生纪念文集》，台北：兰亭书店，1987年。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

王力：《龙虫并雕斋琐语》（《王力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王力：《龙虫并雕斋琐语集外编》（《王力全集》第二十一卷），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王了一（王力）：《龙虫并雕斋琐语》，上海：观察社，1949年。

温儒敏，丁晓萍编：《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

张昌山编：《战国策派文存》，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

## 3. 研究专著

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

蒋勤国：《冯至评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

孔庆茂：《钱锺书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

雷世文：《文艺副刊与文学生产——以〈晨报副刊〉、30年代〈申报·自由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中心的研究》，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

李雪松：《“战国策派”思想研究》，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

楼适夷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 第1编 文学运动》，重庆：重

庆出版社，1989年。

(法)罗贝尔·埃斯卡皮著，于沛选编：《文学社会学——罗·埃斯卡皮文论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潘洵主编：《抗战时期西南后方社会变迁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

(法)皮埃尔·布迪厄著，刘晖译：《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宋益乔：《梁实秋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

唐润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渝纪实》，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年。

王学振：《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学片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上海书店，2003年。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吴野，文天行主编：《大后方文学史》，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3年。

周本贞主编：《西南联大研究》，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

谢慧：《西南联大与抗战时期的宪政运动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谢慧：《知识分子的救亡努力——〈今日评论〉与抗战时期中国政策的抉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解志熙：《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解志熙：《文本的隐与显：中国现代文学校读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解志熙：《文学史的“诗与真”：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美)易杜强著，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

尹鸿禄：《大后方散文论稿》，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

张谷，王缉国：《王力传》，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

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赵丽华：《民国官营体制与话语空间：〈中央日报〉副刊研究(1928-1949)》，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

#### 4. 学位论文、研究论文



姜涛：《“集纳”空间与“马凡陀山歌”的生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马媛媛：《“战国时代的再发现”——40年代大后方文坛的或一侧面》，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余爱春：《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空间》，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余爱春：《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生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期。

王锦厚：《“与抗战无关”论争前前后后》，收入李怡，毛迅主编：《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17》，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

魏小奋：《战国策派抗战语境里的文化反思》，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袁良骏：《战时学者散文三大家：梁实秋、钱钟书、王了一》，《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